

# 自主创新能力与 泛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问题探讨

李文溥

**摘要:**经济增长使产业在地区间转移,但是,特定产业的转移走向必须结合该产业的具体特征进行研究。在泛珠三角地区内部,以杂项制品为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可能产生类似在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越南等国家或地区之间的雁行转移过程。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对促进泛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间转移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将有力地提高企业因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间转移而获得的有形无形资产的产权收益,当这些资产产权为企业所在地区居民所有,所在地区将分享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间转移的企业产权收益,因此,存在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间转移的正向激励。

**关键词:**产业转移;自主创新能力;产权激励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1569 (2007) 05 - 0098 - 07

推动经济发达地区产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既是促进发达地区产业升级,也是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它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中,产业与投资被列为仅次于基础设施的合作领域。

在讨论泛珠三角地区产业协作时,经常提及的一个话题是:产业的梯度转移。一般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国家与地区之间,存在着产业的梯度转移过程。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本地区人均 GDP 水平的提高,资本、土地、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价格将发生变化——资本的稀缺性因人均 GDP 上升、储蓄率逐渐提高、资本积累增加而下降,从而价格将下降;相反,土地因其不可再生性,劳动力因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再生产费用上升,劳动力素质提高,两者的价格都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上升——它使原先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逐渐不再,不得不向土地和劳动力更低廉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原先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则逐渐形成了比较优势,取而代之。我们在自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的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部分东盟国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越南等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合作问题研究”(课题指导:王碧秀,课题负责人:李文溥)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文溥,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看到了这样的雁行产业转移过程。不少论者因此提出:在中国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也可以而且应当促进这样的产业梯度转移。尽管地区间的产业分工协作未必都是产业地区间梯度转移的产物,但是,后者必定会促进前者的发展。因此,发展泛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分工协作,应当促进产业的梯度转移。

但是,正如我们曾指出的:相当长时期内,不仅整个泛珠三角地区,而且泛珠三角地区内各省区内部的产业分工协作都是相当有限的。在广东,市场经济较为发达,区域内经济联系密切,以致形成一定产业协作关系的地区,仍然局限于珠江口一带,即狭义的珠三角地区。广东省的其他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则相对落后,与狭义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联系有限,产业分工协作关系也比较弱。福建也是如此。在福建,目前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当属厦漳泉三市组成的闽南金三角地区或厦门、泉州、莆田、福州四市组成的福厦线沿海地区。闽南金三角的厦漳泉三市,辖区毗连,三市行政中心距离最远不超过90公里。但是,长期以来,三市的经济发展轨迹各不相同。厦门以引进外资为主,泉州重视发展民营经济,漳州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仍以发展农业为主。因此,尽管有闽南金三角之说,但是,三市之间的产业联系却是相当有限的。福厦线沿海地区也大致如此。至于福建沿海地区与山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扩大,沿海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至今未能向山区转移,则一直是困扰福建省政府的发展难题。

为什么在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部分东盟国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越南等国家或地区之间曾经出现的这样雁行产业转移,却较少在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沿海和内地之间出现?我国东南沿海开放地区自1979年起,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外资,经济高速增长持续了近30年,当地人均GDP翻了好几番,按理,这样的产业梯度转移早应发生,但是,它不用说在不同省区之间,就是在广东及福建省内也较少出现。以福建为例,以杂项制品为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20世纪80年代生发于东南沿海福厦线一带地区。到90年代中期,其产业的出口规模(见表1)以及国际竞争力上升到顶点,其中,主要是纺织、服装鞋帽产品,也即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自1998年开始,它们的国际竞争力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见图1),贸易竞争指数从1998年的0.86下降为2004年的0.65(但是,直至2004年,福建省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商品仍然是杂项制品)。与此大致同时,从1996年开始,机械及运输设备类商品的出口比重上升,其国际竞争力明显上升,尽管上升的速度较快,但是,就绝对水平而言,机械设备制造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仍然不高(2004年贸易竞争指数仅为0.20)。

表1 福建省出口商品结构变化 %

项目	1985	1990	1995	2000	2004
出口总值	100	100	100	100	100
初级产品	44.7	21.8	20.3	10.6	6.8
工业制成品	55.3	78.2	79.7	89.4	93.2
化学及有关产品	4.4	2.3	1.2	2.7	9.8
按原料分类的产品	8.5	5	4.5	15.1	13.3
机械及运输设备	5.7	20.1	16.5	26	37.3
杂项制品	36.7	50.8	57.5	45.6	40.5

资料来源:根据《2005年福建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得到。

可以看出,尽管进程缓慢,但是机械设备制造等资本及劳动技能密集程度超过杂项制品产业的产业逐渐替代杂项制品产业成为广东、福建等省沿海开放地区的主要产业已是大势所趋,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种两头在外的杂项制品产业尽管其国际竞争力开始下降,但是,

人们所期待的这些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向内地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并没有大规模出现。少量的杂项制品产业仅仅向毗邻的内地县份略微扩展了一点,大部分的杂项制品产业仍然停留在沿海地区。近年来,在福建内地山区逐渐发展起来的FDI企业及民营企业,大多不是沿海原有的“两头在外”出口加工型企业的内移,而是一些具有明显原料指向、以利用山区自然资源为主的加工出口型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的“两头在外”的杂项制品产业不向我国内地转移,而是直接转移到比我国内地发展水平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如越南等国家或地区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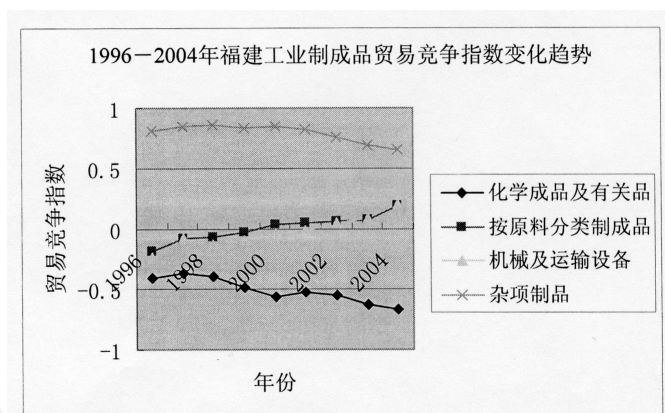


图1 福建省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指数变化趋势

## 二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杂项制品产业因所在地区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发生变化,生产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之后,没有按照一些论者期望的那样,向我国内地雁行转移,原因在于杂项制品产业由于产业性质所限,难以向内地梯度转移。杂项制品产业是一种典型的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杂项制品产业的主要成分是那些意在利用沿海地区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供给、便捷的进出口条件的FDI企业及接受国外订单的代工型民营企业,因此,基本上是一个缺乏自主技术、专利、品牌和国际销售网络的代工型产业,其所赚取的只能是微薄的代工费用。由于这些产业的原料及市场均在海外,这些企业不过是跨国公司众多分厂或生产车间之一,之所以在我国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沿海地区投资设厂,主要目的是利用设厂地区的相关优势资源(主要是低廉的劳动力及土地价格),完成最终产品生产的某个加工环节,因此,它不仅要求当地的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足够低廉,而且要求生产地距离空港、海港尽量近,原料进口及产品出口的交通运输条件高度便捷。一旦我国沿海地区因经济增长导致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上涨到这些企业难以承受,需要转移到其他地方生产,那么,从加工成本与流通成本两方面综合考虑,首选的地点不可能是我国的内地,而是其他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我国的发展中国家的沿海交通便捷之地。

之所以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虽然经济增长多年,但是此类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至今仍未大规模地退出,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内地每年大量涌入沿海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使沿海地区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得以延长其生命周期。据我们2004年进行的福建百家民营企业调查的问卷数据统计:2003年,福建省9个设区市各类民营企业一般工人和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分别为1.2万元及1.6万元。尽管福建省9个设区市的人均GDP最大差距接近1:4,但

是,各设区市外来民工最为集中的民营企业的工资水平却是惊人的趋同:在全省各设区市中,一般工人平均工资水平最高的是福建省的沿海开放城市——泉州,其平均工资水平也仅高出全省平均水平的 25%,而平均工资水准最低的竟是地处沿海的省会城市——福州,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 83.33%;技术工人平均工资水平最高的是福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经济特区城市——厦门,其平均工资水平也仅高出全省平均水平的 25%,最低的是福建省人均 GDP 最低的欠发达地区——宁德市,但是,其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也只会比全省平均数低不到 20%。厦门与宁德的人均 GDP 之比接近 4:1,可是民营企业的技术工人平均工资之比却只有 1.54:1;一般工人的平均工资之比竟然只有 1.17:1。

表 2 不同地区被调查民营企业相同类型员工平均工资比例  
(以不同地区同类员工最低平均工资水平为 1)

企业所在 地区	高级管理 人员	一般管理 人员	高级生产 技术人员	一般生产 技术人员	技术工人	一般工人
福州	1.00	1.29	1.1	1.24	1.07	1.00
莆田	1.08	1.24	1.03	1.06	1.15	1.10
泉州	2.62	1.65	2.13	2.35	1.46	1.50
厦门	1.57	1.94	1.30	1.71	1.54	1.40
漳州	1.27	1.24	1.00	1.35	1.23	1.10
南平	1.76	1.12	1.03	1.00	1.08	1.00
三明	1.27	1.76	1.00	1.00	1.23	1.00
龙岩	1.11	1.00	1.13	1.06	1.08	1.10
宁德	1.00	1.18	1.05	1.06	1.00	1.20

资料来源:李文溥、龚敏等:《福建省百家民营企业调查总报告》,王碧秀主编:《民营经济的崛起与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5 页。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尽管不同地区之间的工人工资水平已经足够小,远远低于所在地区人均 GDP 之间的差距,但是,调查发现,那些年平均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工人的加班时数往往也较多,工时波动率也较高。因此,如果以小时工资率计算,那么,各地区之间的工人工资水平差距则更小。例如,泉州民营企业一般工人的小时工资水平仅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3.59 个百分点,技术工人的小时工资水平甚至还低全省平均水平 1.36 个百分点。考虑到工时波动率等其他因素,泉州民营企业一般员工的实际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显然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尽管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之后,这些产业并不向内地转移:不断向沿海地区流动的民工潮,使沿海地区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供给,正是因此,近 30 年来,尽管沿海地区人均 GDP 翻了几番,但是,外来劳工工资水平却上升得很慢。在福建,沿海地区和山区的工人的工资水平基本上是一样的,在泛珠三角地区不同省份之间,情况也大致如此。<sup>⑩</sup>在这种情况下,沿海地区的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企业如果转移到国内内地,得(土地价格较低)失(流通成本上升)相抵,未必收益大于损失。因此,这些企业更为理智的选择,是尽量压低劳工工资水平以及其他开支,延长企业在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生命周期,直至在当地生产的成本优势从而国际竞争力基本丧失之后,才会考虑把产业转移到比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沿海地区。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一般而言,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会因为原所在地区经济增长所导

致的资源禀赋条件变化而转移到其他地区,但是,特定产业的转移走向必须结合该产业的具体特征进行研究。在泛珠三角地区内部,以杂项制品为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可能产生类似在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越南等国家或地区之间的那种雁行转移过程。

三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兴盛一时的以杂项制品为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现在正在取而代之的以生活消费与办公类机电设备为代表的一定技能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共同特征是:简单加工装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大多是FDI企业以及国内代工型企业,因此,普遍严重依赖国外母公司或订货商的技术、专利、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固然,经济起飞过程中,引进这些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装配型产业,很好地利用了本地的优势资源,使沿海地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因此,在开放初期,大力引进这些产业的必要性不容置疑。但是,世间所有事物都是利弊并存的,发展此类产业在一定时期内能很好地利用当地的优势资源的同时,也将因此累积起不可忽视的矛盾。由于它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专利、品牌和销售渠道,因此,大量发展这些产业,不仅在微观层面上导致了企业在技术、专利、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上严重受制于人,企业剩余大部分被国外生产要素所攫取的被动局面,<sup>⑩</sup>而且在宏观层面上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国内消费需求持续不振。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自1983年以来,基本上呈下降趋势,自2000年以来,消费支出在GDP中的比例更从61.1%一路下滑到53%;投资需求从36.4%上升到44.2%;1994年以后,净出口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上(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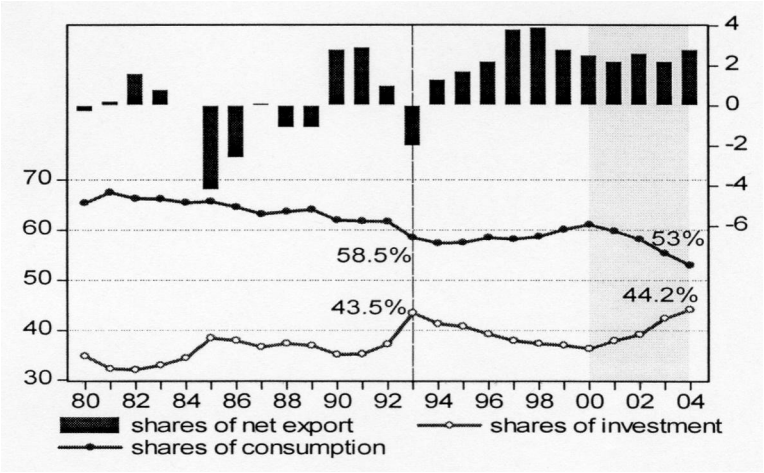


图2 我国总需求支出结构

总需求构成呈现“两高一低”,即“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失衡状态。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政府多年实行的意在扩大内需的需求管理政策并没有实现其基本的政策目标——扩大国内消费需求,<sup>⑪</sup>主要是扩大了投资需求,尤其是政府的公共投资需求,用投资的增长替代消费的扩大拉动经济增长。它在维持经济较高速度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投资效率降低,增长效益下降的负面影响。经济的高增长之所以未能有效地扩张国内消费需求,根本原因在于扩大内需的政策不能提高国内居民尤其是劳动要素提供者的个人收入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产出的相当部分是依靠增加净出口实现的,贸易顺差因此急剧扩大。它导致了对内流动性严重过剩,对外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

扩大内需的政策不能提高国内居民尤其是劳动要素提供者的收入水平。有不少论者因

于分配政策不合理,大声疾呼政府应当启动收入再分配手段,使低收入者增加收入。固然,对于现有的收入分配结构,政府难辞其咎:为了追求高增长,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有意识地压低当地国内生产要素的价格以吸引外来投资,它势必浪费资源,牺牲环境,增加增长成本。但是,在经济增长为地方行政第一要务的大势之下,显然,呼吁政府启动收入再分配手段,使低收入者增加收入,不过是书生的良好愿望而已。但是,即使排除这一因素,也可以发现,在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要想较大幅度地提高国内居民尤其是劳动要素提供者的收入水平是不现实的。经济全球化使实行开放政策的经济体的国内要素价格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如果一个实行开放政策的国家只能向世界市场提供低素质从而低附加值劳动,其产品主要是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只能应用价格竞争手段而不是品质竞争手段打入国际市场,那么,这个国家的国内要素价格就必然偏低,较大程度地提高国内居民尤其是一般劳动要素提供者收入水平的愿望也就难以实现。显然,这样的发展道路,不仅是宏观层面上导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地区间关系而言,不利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而且就东部沿海地区本身的经济发展而言,从长远看,也是难以长久持续的。

要使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获得长盛不衰的驱动力,必须使之建立在国内居民强有力的消费需求基础上,而这,根本出路是提高国内居民尤其是劳动要素提供者的收入水平。但是,在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要想较大幅度地提高国内居民尤其是劳动要素提供者的收入水平是不现实的。改变中国目前国民收入分配从而社会总需求支出结构失衡状态的根本之路在于改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的国际竞争战略必须从传统的以压低国内要素供给价格为基础的价格竞争战略向建立在自主创新基础上的品质竞争战略转变。

我们认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对促进泛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间转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这一判断,我们以下论证采用了反证法:从分析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情况下,产业结构升级与地区间转移缺乏必要的激励入手,论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对促进泛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间转移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它提供产权激励。

首先,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经济发达地区将缺乏促进夕阳产业外迁的动力。众所周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起来的产业,先前主要是以杂项制品为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主要是以生活消费类和办公类机电产品为代表的一定技能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杂项制品产业面临着向外转移的需要。在正常情况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本地自有资本的产业因本地经济增长导致的资源禀赋结构改变,竞争优势不再而需要向外转移,原产业所在地区不仅获得本地资源因此优化配置的效益,而且因产业外迁获得对外投资(包括资本、知识产权以及人力资本、管理经验、销售网络资源等)收益以及知识产权、人力资本、管理经验、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利用上的规模经济收益和范围经济收益,因此,如果后续的接替产业发展顺利,原产业所在地区存在着鼓励夕阳产业外迁的激励,但是,在产业主体是FDI企业和代工型企业情况下,产业外迁,原产业所在地将无法(在FDI企业情况下)获得或者基本无法(在代工型企业情况下)获得对外投资收益。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原产业所在地区鼓励夕阳产业外迁的动力是不足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在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没有自主技术、品牌、专利和销售网络的情况下,原产业地区在产业更新换代方面的诱因是不足的,至少低于本地产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本地自有资本的情况。

其次,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产业所在地区在鼓励跨地区产业扩散方面的动力也是不足的。其原因与此前的分析是基本一样的。在产业所在地区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情况下,产业所在地区鼓励跨地区产业扩散,并存在着四个方面的激励:一是因跨地区扩散而利用不同地区

的比较优势资源获得的成本节约收益;二是因跨地区扩散而获得的资本对外投资收益;三是企业所拥有的知识产权、人力资本、管理经验、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因产业的跨地区扩散而在其利用上产生的规模经济收益和范围经济收益;四是跨地区扩散降低了产业在本地区过密集聚而产生的净负效应(扣除了产业在本地区生产可能带来的净收益)。但是,如果产业所在地区的的企业都是FDI企业或者代工型企业,那么,产业所在地区鼓励跨地区产业扩散,就只剩下一个激励:跨地区扩散降低了产业在本地区过密集聚而产生的净负效应(扣除了产业在本地区生产可能带来的净收益),此外的三方面收益由于是归资本或自主知识产权所有者所有的,在产业所在地区的的企业大多是FDI企业和代工型企业情况下,产业所在地区是难以获得或者分润的。因此,可以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在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没有自主技术、品牌、专利和销售网络的情况下,原产业地区在鼓励现有产业跨地区扩散方面的激励是严重不足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对促进我国尤其是泛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间转移具有重要的意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之所以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间转移,关键在于,它将有力地提高企业因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间转移而获得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产权收益,而在企业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产权是所在地区居民所有的情况下,所在地区将因此分享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间转移的企业产权收益,因此,存在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间转移的正向激励。至于接受这一产业转移和扩散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只要这一转移和扩散造成的净效益大于负效益,显然是乐于接受的。

#### 注释:

王碧秀、李文溥、谢孝荣:《构建发展泛珠三角地区产业合作的前提与基础》,《东南学术》2005年第6期。

胡颖、李文溥:《产业竞争优势变迁与产业结构演变趋势》,《东南学术》2006年第1期。

有关分析,请见拙文:《开放经济的出口竞争力产业间转移与产业结构演进》,《中国经济问题》2001年第2期。

在福建内地山区,有两类企业是比较突出的:一类是利用当地资源的食物加工企业,一类是为沿海服装行业提供布料的纺织行业。

最近,笔者遇见一位刚从越南回大陆来的台商。他告知:在越南遇到了很多过去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投资的台商,他们在越南的工厂的经营管理人员大多是中国大陆来的,来自这些台商早先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投资的企业。这位台商告知,现在在越南,受雇于这些FDI企业的当地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大约折合20美元。相比之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同类企业打工者的工资水平尽管从我们的角度看,已经够低,但是仍然高出越南许多。

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的定义:无论企业大小,凡是一个企业在两个以上国家设立工厂,均为跨国公司。按照这个定义,在我国投资的绝大部分FDI企业,都是跨国公司。

笔者曾在福建省漳州市的漳浦县访问过一家生产花园设备及制品的台资企业。该企业的台湾管理人员告知:此类企业在投资设厂选址上,要求工厂所在地离国际空港的距离不超过100公里,离货物进出口的海港距离不超过200公里,距离主要上游企业的距离不超过300公里。如果离空港的距离超过100公里,客商便不愿意来企业考查,可能因此失去大量订单,如果离海港距离超过200公里,距离主要上游企业的距离超过300公里,附加的运输成本便使企业难以承受。这三个同心圆就决定了此类企业可能布局的地理空间。漳浦县虽仍属福建东南沿海地区,但是,距离最近的国际空港已经略微超过100公里,因此已属此类企业布点的边缘地区,企业之所以布点此地,是当地政府部门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

李文溥、龚敏等:《福建省百家民营企业调查总报告》,王碧秀主编:《民营经济的崛起与发展——福建百家民营企业调查报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15页。

工时波动率是衡量劳动者每日工作时数均衡与否的一个指标,既定年或月工时从而既定年或月工资条件下,工时波动率越高,劳动者的工作疲劳程度越高,单位工资收入的劳动强度越大。

⑪《厦门日报》2007年初曾报导了这样的消息:今年春节过后,厦门的企业到重庆招工,到了当地之后发现,他们所确定的工资水平与当地企业的工资水平相差无几,根本招不到工。

⑫2006年初,笔者走访了深圳一些企业,其中一个DVD企业的老板向笔者诉苦:尽管在他的企业中,工人的工资水平已经很低,但是企业生产一台DVD只能赢利10到20个美分,可是,每生产一台DVD,他必须向国外的专利持有者支付1美元以上的专利使用费!自2002年起,广东、福建沿海地区持续遭遇“民工荒”,民工荒的根本原因是当地企业工资水准太低,而当地的生活费用不断上升,民工打工所得与在内地农村(据笔者2006年夏在福建农村的调查显示,至少与在福建闽西北山区的)务农的收入所差无几,因此,农民的打工热情急剧下降。可是,广东和福建的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企业却难以提高工资水平,原因在于国外厂商利用其垄断的技术、专利、品牌和国际销售网络,将国内代工企业的工缴费压得很低。

⑬我们认为,扩大内需的真正目标是扩大初始需求——国内居民消费需求——而不是其派生需求:投资。